主持人语：很多研究者感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源贫乏，没被“开垦”的学术领地少得可怜。其实这是认识误区。正在延展的文学史在不断输送研讨话题，新视角与方法起用能在旧材料里发掘新题目，别人阐释过的问题中仍有可待耕拓的空间，本期三篇文章就都在“老”对象中做出了“新”意。军旅诗歌形象基本已经定型，卢桢、刘沙沙的《21世纪军旅诗歌的审美新变》却突破成见，从思想、艺术表现指认其新世纪的审美新变及内蕴的可能性，绵密而扎实；象征派诗常被与“颓废”捆绑非议，但田源的《中国象征派新诗唯美风格的读者批评与“颓废”阐释》，从诗人气质、诗歌意境和诗学理想探讨“颓废”审美现代性的生成肌理，在学术上为“颓废”正名，大胆又谨慎；《汉园集》中“古城”形象研究成果颇多，王子健的《〈汉园集〉中的“古城”与“废墟”及其现代时间意识》后发制人，对“古城”形象内涵、诗人态度和背后的现代时间意识的透析深入且辩证。三篇文章的思考均以文本细读做支撑，体现了良好的研究风气和学术信度。（**罗振亚**）

21世纪军旅诗歌的审美新变

卢　桢　刘沙沙

内容提要：21世纪以来，军旅诗歌从语言基础、运思模式、审美向度到思想质地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历史现场的多维深掘、生命状态的真实叩问与时代生活的诗性观照，成为军旅诗的显在主题。诗人们将军人的铁血担当、精神力量以诗的方式呈现出来，其波澜壮阔的声势、风雷浩荡的品格拓展着新诗的审美境界，丰富着新诗书写的可能性。21世纪军旅诗在中国军旅新诗及新诗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关键词：21世纪　军旅诗歌　审美新变

DOI:10.13896/j.cnki.wxywh.2026.02.004

军旅诗是一种题材殊异的诗歌类别。从《周易》中渗透着战争经验的杂言诗，《诗经》中的征夫、思妇诗，到唐代以王昌龄、高适、王维、杜甫、岑参等诗人为代表，将边地经验推向高峰的边塞诗，包括现代以军事生活为题材的各式诗歌，都是特定时代、特定群体的特殊生命体验书写。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军旅诗早已演化出独属于自身的艺术和精神传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现代中国的军旅诗[①]至今已走过百年历程，它的传统与先锋、辉煌与黯淡，构成了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一部分。然而长久以来，很多从事军旅诗歌创作的诗人，并没有把诗歌当作一种生命本体意义的存在表达。生活经验、知识结构、文化视野等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使他们的诗歌带有一种惯性经验驱动下的同质化倾向。很长一段时间内，军旅诗人都在“努力地写满山红花、枪和堑壕，停留在对自然和武器以及一些战争场面的描摹阶段，然后赋予它牺牲、崇高、神圣、自豪之类的含义，给诗以升华”[②]。因此，大量浮于生活表层的书写之后，军旅诗反而离真正的诗歌越来越远。

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社会转型、文坛革新、当代诗人努力使诗“回到人生、回到诗歌本身”的创作探索、“新边塞诗”兴起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军旅诗人们开始进行现代主义诗歌的尝试，重新思考“军”和“人”的深层内涵及其中密不可分的生命关联。他们在诗歌言说、表达方式上不断突破自我，出现了像李瑛的《我的另一个祖国》、周涛的《山岳山岳，丛林丛林》、朱增泉的《前夜》、简宁的《倾听阳光》等独具魅力的作品，为之后的军旅诗创作提供了较好的艺术参照。

发展至21世纪，伴随军事形态的深层变革、时代语境与社会观念的转型、文学审美生态的迭代、技术媒介与传媒环境的重构，扎根军旅生活的诗歌再次进行了创作上的调整。诗人们重新审视自我、诗歌和时代之间的关系，在现实主义传统中不断深入，锻造出了《上甘岭》《蹈海索马里》《钢铁集结》等直面历史现场、紧跟时代步伐、回归军营生活本相的新样态军旅诗。这些作品在延续以往抒情主题和观照对象的同时，强化了诗歌的叙事性和象征性，抒情主体以紧贴时代的智性思考、传统表达与创新探索交织的发展视角，拓展着文本指涉的时空维度，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军旅诗歌的艺术呈现方式。诗人们把军旅诗歌从“描摹”放归到“发现”，在“及物”的诗语运思、新颖的意象营造、鲜活的经验转化以及饱含热血的生命吟唱中，对话历史与现实，其书写既有钢筋铁骨的精神硬度，又不失细腻真挚的情感温度，整体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军旅抒情诗的时代性、现实感和多元交融的美学韵味。

一　精神探索：回归历史与深入时代

与传统诗人通过创作摸索、建构出的具有美学指导意义的诗歌信仰不同，军旅诗创作主体更多遵循的是一种精神信仰。独特的生命体验，使他们拥有特色鲜明的诗学资源，对具体历史与诗歌现场的双重关注，又使其书写兼具历史语境的真实性和生命诗学的力量感。

21世纪的军旅诗创作，大多是以诚挚的心抚摸历史的真实纹理，从战士的鲜活面孔、血肉疼痛，抵达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生命现场”，然后将其转化为能够有效承担历史、点亮现实的力量。如果说以周涛为代表的“新边塞诗”继承了中国诗歌传统中最辉煌盛大的一脉，让读者在其中感受到“万丈雄心与千里激情，历史的崇高感和开拓者的胸襟”[③]，看到大写的历史、大写的青春、大写的人

① 现代军旅诗歌原指由现役军人创作的，描写战争、军旅生活的诗歌，这一范围后来在朱向前的《中国军旅文学50年》中被扩大为“以战争、军旅生活和军人情感作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一种特殊题材的诗歌样式”，在创作主体、书写对象和书写题材上都有所扩容。朱向前将当代军旅诗人划分为三个代际：以李瑛为代表，崛起于朝鲜战场上的未央、柯原、章永枚，加上崛起于西南边疆的公刘、白桦、顾工等为第一代军旅诗人；进入新时期以后，以“新边塞诗人”周涛为代表，描写南线战争的贺东久、刘立云、朱增泉等，加上李松涛、马合省、王久辛、程步涛等为第二代诗人；第三代则是指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80年代中后期崭露头角的年轻诗人，如简宁、蔡椿芳、辛茹、康桥、阮晓星、史一帆等人。参见朱向前等著：《中国军旅文学50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81~228页。

②《军旅诗的现状及其他》，《文学自由谈》1991年第2期，第107页。

③ 王敏：《周涛诗歌创作的新历史主义倾向》，《扬子江评论》2008年第5期，第31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和大写的“自我”,[①]那么,当下的军旅诗歌则延续了这种历史意识。诗人们打破了传统军旅诗歌以历史为背景,远距离歌唱的政治抒情藩篱,将宏观主题落实于真实的生活肌理,在个人化的历史想象中强化着整体性的价值关怀。

面对和平年代单一、纯粹的抒情无法传达日益厚重的历史记忆和逐渐复杂的现代生存经验这一创作现实,诗人们选择回到历史现场进行经验转换,以此给今天的信仰描红。当朱增泉在历史钩沉中思索人类生命的永恒意义时,他说:“沉重历史是我带血的胞衣/历史很痛苦/我很痛苦。”[②]对于来自革命摇篮井冈山的刘立云来说,军旅诗人延续着颂歌时代的传统,更肩负着和平使命的传承。回顾抗美援朝那场立国之战,刘立云创作了长诗《上甘岭》[③],“希望以诗歌为触须和媒介,对那场惊心动魄的战争,还有对当下的国际政治、未来的战争格局,作出自己的判断,发出自己的声音”[④]。他在诗中写道:“上甘岭。一座露天战争博物馆,展台/磅礴,赫然陈列它陡峭的天地线/被炮火大面积大尺寸/削低的高度;锈死在幽暗尘土里的/铁;还有它的荒凉、神秘和孤寂;它因长期无人问津/而被越来越深的草木掩盖的呐喊/呼吼,和骨头的断裂声,鲜血的滴答声。”在胜利的欢呼和呐喊被不断传递、反复拔高时,战争的参与者和准备者是清醒的,他们深知每一次的和平与胜利都来之不易,丰碑下埋葬的每一个年轻人都不该被忘记。于是,诗人选择回到上甘岭,选择将战争现场血淋淋的一面拿出来给人们看,看那些比钢铁更坚硬,比蚂蚁还渺小的生命,如何以身死换和平。

军旅诗中英雄的颂歌有很多,宏大历史的反思也很常见,但刘立云关注的是战斗者更为复杂幽微的精神运动。他一直在向历史和生活的纵深处挖掘,并试图将战争背后那被热血洗涤、被炮火磨砺的人性和精神力量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所以,当他想到抗美援朝、想到上甘岭,想起那场战役的惨烈和悲壮,他再次意识到“挖掘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⑤]。在气吞山河的正面搏斗背后,刘立云看到“钢铁紧密的躯体,在瞬间解体”,战士们“悲愤而绝望的鸣叫声”被炮火淹没,看到明知战场就是坟场,前方等待自己的是死亡,“是中弹后痛不欲生的嚎叫/是侥幸活下来的惊魂未定/是生不如死的恐惧、惊慌,和从此永远无法挣脱的/梦魇”[⑥],战士们还是一跃而起,在黑夜中倒下再互相搀扶着爬起来,直到尸体“层层叠叠地垒筑起高地的另一种海拔”,直到冲锋者作为军魂,重回胜利的队伍。那一刻,观照者是诗人、是军人,也是渴望与平凡英雄一同战斗的普通人,多重身份带来的精神盘诘在刘立云身上交织,执笔者再无法忽视枯燥的死亡数据背后鲜活的生命跳动,他不自觉地将目光投向“没有姓名牌的军队”,投向“38个黄继光”及其身后无数个历史来不及数的名字。诗人将这些被历史遗忘的名字从战争的深处挖掘出来,让读者从他们身上看到战争和死亡的真相,感受到战士带着疼痛的体温和呼吸,从而将战斗者遗落在历史战场的血肉筋骨拼接完整,将历史真相补充完整。

这种沉重历史的痛苦也长久地存在于王久辛的诗中,他曾以带血的长诗《狂雪》为被日寇屠杀的三十多万南京军民招魂,以《艳戕》向红军西路军八位十三四岁的少女战士致敬,并通过《蓝月上的黑石桥》等长诗,沉入历史,拷问现实,提醒人们思考和关注时代。其创作既有对军旅使命、家国情怀、集体精神的深度表达,也有对个体情绪、私人感受、差异化生命体验的挖掘与呈现;既关注宏

① 王敏:《周涛诗歌创作的新历史主义倾向》,《扬子江评论》2008年第5期,第34页。

② 朱增泉:《星空》,《国风》,作家出版社,1990年,第38页。

③ 刘立云:《上甘岭》,《金盔:刘立云诗选1984—2019》,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304页。

④ 舒晋瑜:《刘立云:用诗歌触摸刀尖上的锋芒》,《中华读书报》2021年8月14日,第11版。

⑤ 刘立云:《挖掘》,《金盔:刘立云诗选1984—2019》,第21页。

⑥ 刘立云:《上甘岭》,《金盔:刘立云诗选1984—2019》,第313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大主题，也重视对日常琐碎细节、微观人性的细腻书写。与此同时，诗人勇于打破传统军旅诗歌在题材、时空上的限制，以开放性的创作视野，将笔触延伸至国际维和行动的实践现场，《蹈海索马里》[①]一诗，既是创作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诗性关切，也是见证现代军队走向深蓝的里程碑式作品。

长诗紧扣索马里中国使馆遭遇恐怖袭击这一时事题材，以主人公张楠作为进入战争记忆的钥匙。长诗开篇即“眼前呈现的是一截一截的血肉／而且有几只胳膊／和大腿　还冒着烟／有一颗长发头颅　还睁着双眼……”的血腥历史。紧接着，诗人从唐代诗人的月光、少女被炸碎的身体、大使肩负的任务，进入索马里的月夜，揭开地球另一边的人民被奴役的命运。通过讲述他们遭遇的贫困、饥饿、战争、死亡，进行生命的思考、文明的反省、人性的救赎和对人类良知的指刺。他写到战士们贴着死亡的心脏与死神对峙，听死亡的心跳声，写到“主人公张楠”选择留在悲剧和恐怖之间，代表祖国甚至代表人类“和索马里难民一起　深入恐惧／接受煎熬”。在大历史氛围中，细微、复杂的人性被凝练成文字，崇高使命与个体生命价值的探讨、奉献与牺牲的深层叩问，被诗人以通感的诗语诉诸笔端。《蹈海索马里》不是旁观者的回忆，而是经历者的血书，里面的痛苦属于所有战斗者、牺牲者、受难者，甚至属于全人类。所以，在诗的最后，当诗人为之疾呼，“大海　大海／你何时能够汇成　悲悯的大海／以你恢宏无比的力量／把冷漠变成同情／把同情变成怜悯／把怜悯变成救赎／把救赎变成信仰／变成地球上的　每一位公民／所有生活的行为准则和习惯……”，生命的信仰跨越了民族、国别界限，宏大而细腻的人文关怀弥漫在字里行间，诗歌也在情感的收束中完成了精神的升华。

当视线回到新时代现场，在戎装者淬砺锋芒、步履铿锵奔赴向前的路上，刘笑伟作出了见证性的《朱日和：钢铁集结》[②]。他将朱日和这个曾经只能用“某”来称呼的神秘基地，以标题的形式、战斗集群集结的声音记录在诗歌中，留存在文学记忆里。诗人从红军长征的日夜、延安窑洞的烛火写到巨舰驶向深蓝、利剑直指苍穹，在他的笔下，军旅征程上品味硝烟芬芳的年轻面孔如“热血开在身体外的漫山遍野的红杜鹃”，这支钢铁的集群、战斗的集群是“转折关头升腾的烈焰”，也是“潜在最深处的／无言的威慑”。和平年代读者所不熟悉的惊天动地的现代战争身影，在朱日和这个沙漠腹地，在现代军队绿色海洋般的雷霆行动中，以诗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些雄浑、壮阔、充满浩然之气的诗篇，是这支队伍变革发展的细节见证，也是军旅诗人在以诗歌书写时代和历史中不断拓进的艺术尝试。

王久辛曾“强烈呼唤作家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格魅力、人格精神、人格风采俱佳的时代英雄的大作品”[③]，也即以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历史，使历史具有“当代性”。与传统军旅诗相比，21世纪军旅诗中的“当代性”不只有历史的反省，也兼具时代的见证，不只记录伟大时代，也关注军营生活细节。创作者们打破了大英雄的神话，他们关注每一位淹没在“大”洪流中的“小”浪花，“在集体的覆盖下努力去呈现个人内心向度、描绘个体的精神图谱”[④]。像刘立云的《三个中国军人，三个中国农民的儿子》、刘笑伟的《最鲜艳的红——写给王继才、王仕花夫妇》、艾蔻的《雷神的救赎——献给杜富国和他的战友们》等诗，都是以在场者的身份，记录坚守者、冲锋者生命脉动和精神流向的典型作品。与惯常的英雄行为歌颂不同，诗人更注重挖掘普通战士铁骨之下的柔情、崇高背后的平凡、毅然选择的思想活动和复杂的情绪瞬间，在这些诗中，战争不再是特定时

① 王久辛：《蹈海索马里》，《解放军报》2017年7月17日，第12版。

② 刘笑伟：《朱日和：钢铁集结》，《岁月青铜》，中国言实出版社，2021年，第4页。

③ 王久辛：《致大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第306页。

④ 杨碧薇：《汉语新诗中的“叙事”考辨》，《当代文坛》2022年第3期，第190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期的历史氛围,而是战斗者真实的生活。这类诗歌所呈现出的及物性和现实感,流淌在记录平常生活的字里行间,但它不是对小情小调的复制,也不是对虚浮之事的摹写,而是一种时代情绪的释放,如同姜念光从一位守岛士兵的来信中引申出的抒情困惑(《海防来信,说到了诗》)、朱建信从自己宁静内心中拆卸的一场战争(《拆卸一场战争》)、董庆月以一位新时代年轻士兵的现场感发出的军营歌唱(《士兵的二十四小时》)等,平凡生活的诗意提取,加上诗人的时代之思,使得当前的军旅诗在重复的经验书写中变得细腻而深刻,也在不知不觉中透出厚重感和思想性。

“在特定意义上说,战争与和平囊括了人类所有的生存状态。”[①]21世纪军旅诗的创作者以主体真实重走战争路线,以生命真实留存时代记忆。他们或是深刻牢记那些特殊的地方(程步涛《记住那些地方》)、那些先辈们流血牺牲的日子(峭岩《它的名字叫七月》)、那些倒在黎明前夕的战友(艾蔻《左克的小名叫:蚂蚁》);或是站在军事纪念馆,从带血的遗物上想起那段不怕死的战斗日常(徐卓然《红军草鞋(外一首)》)、从历史的硝烟中整编新锐的队伍时刻准备再出发(姜念光《一队人马在孟良崮战役纪念馆》);又或是在驻训的原野大风中锤炼虎豹般的峻意决念(雷晓宇《与豹子同眠》)、在海岛带着镜子却遗忘自己的身份是一名女兵(艾蔻《永兴岛上的镜子》)……21世纪军旅诗诉说伟大,也倾听平凡,铭刻战争,也反映时代,在边防、海岛、长空,在靶场、哨位、营房,每一个迷彩身影到达的地方,都是战斗号角吹响的诗歌现场。

21世纪军旅诗是创作者以骨头作琴弦、用生命奏响的时代战歌,其浓郁的、信仰的诗意,构成了中国当代诗歌灵魂的一部分,也是让读者能被真切感动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军旅诗歌在历史维度、时代现场、人性深度上完成的诗性观照,以细微和宏阔结合的魅力,有力地影响着当下诗坛,为当下诗歌精神境界的深入拓展提供了支撑和参照。这些兼具精神势能和行动能量的军旅诗,以纸上的火光,将当代诗歌挺进时代的道路再次点亮。

二　诗语呈现:语言更新与意象重塑

如果说军旅诗歌介入现实,只满足于和时代做短兵相接的对抗,那这些诗歌极有可能成为应景的呐喊之作,而非传之于世的经典史诗。如何在时代介入和诗意呈现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正是21世纪军旅诗努力的方向。随着时代语境的转变,抒情主体的创作空间也在不断扩容。21世纪军旅诗在创作中延续并强化着传统军旅诗对视听语言的重视,同时又打破了军旅诗因惯性书写被固化的词汇、语料库。诗人们将思维触角深入日常生活内部,及时捕捉新质意象,密切关注军人思想行为变迁,通过“及物”的对话式书写,更新着军旅经验的诗语表达。

诗是生命的泉涌,是“个体生命和语言的瞬间展开”[②],以血肉之躯正面对抗战争和死亡的军旅诗尤为如此。当军人开始写诗,他们的生存经验便为其提供了特色鲜明的资源库,传统军旅诗人往往在其中挑选与自身经历共鸣的部分,以心灵的独白、反抗的呐喊完成个体存在的确证或群体无声的命名。而当下的军旅诗人大多选择以肉体参与并承接宏大历史、以语言的冒险进入生命瞬间,从而将主体记忆与历史精神在诗歌中交融互渗,书写中更添了和时代对话的力量感。

其实,历代军旅诗人都在寻找歌唱祖国、歌颂时代最动人的诗语。从20世纪50年代末央的“祖国,我回来了/祖国,我的亲娘”(《祖国,我回来了》)、公刘的“我穿过勐罕平原/整个心灵都被诗句充满/每踩一踩这块土地/就感觉到音乐/感觉到辉煌的太阳/感到生命的呐喊”(《我穿过勐罕平原》),到60年代郭小川在《甘蔗林——青纱帐》中发出的“心跳的声响”“欢欣的吟唱”,包括贺

① 刘立云:《烤蓝》自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4页。

② 陈超:《诗野游牧》,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4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敬之70年代出版的《放歌集》、韩作荣80年代出版的《北方抒情诗》、贺东久90年代出版的《带刺刀的爱神》等，都是以生命高歌或低吟的形式，抒情感怀、阐释时代。发展至21世纪，军旅诗的时代抒怀中出现了更多对话的声音。诗人们以更加自信、沉稳的格调，为军旅诗行注入新时代的生命情思。他们或是像山一样怒吼、咆哮，“在歌声中浮沉，在歌声中站立和行进……用震颤世界的铜号，喊醒一片沉睡的大陆”[①]，或是等待枪声撕碎长夜，听旗帜翻卷、呼啸，用热血“唱一支浩歌惊天动地”[②]，或是“向大炮学习表达”[③]，听旋律在深处咆哮，包括《擦枪的声音》《隔墙的声音》《我们用歌声掩盖你害羞的声音》等，都是当代军人走出自我、对话时代、紧密联系生活现实的诗语实验。典型的像姜念光的《美学课》[④]，诗歌以对话的形式开头，“你看，这个战士刚刚跳跃到最高点”，从一个旁观者、事件讲述者的视角记录战士的训练过程，有跳跃成功时，询问式的肯定：“端着的步枪背带飞了起来／还有什么更美的曲线／能够呈现，那种细致如绳的机敏”；也有训练结束时，对战士形象和精神的交互式想象：“他虽然是我们的祖父，看上去却像我们的弟弟／如果非要说，这个英俊的跳跃还缺少点什么／我们可以让他嘴里咬着一朵野花。”在姜念光的诗中，训练中的战士不是沉默和重复的队列之一，训练的行为也不是单调无味的机械记忆，士兵和训练共同组合成“力与美”的课堂，他的每一个动作仿佛都在邀请众人的检阅和批评。极为普通的训练场景，被姜念光放在《美学课》中，用对话的想象力和冲击力，完成了诗意的跳跃，诗人也在语言意义上实现了诗性的自由。

在与时代对话的军旅书写中，长诗和女性诗歌就像雪松与红梅，一个以持续的力量型写作对话历史和现实，一个用细腻的情感型写作倾听平凡生命的诉说，二者互相补充，交织共鸣，在军旅诗的旷野碰撞出异质混成的特殊美感。长诗如峭岩的《遵义诗笔记》、王久辛的《大地夯歌——谨以此诗为中国工农红军将士铸碑》《蹈海索马里》、辛茹的《火箭碑》、康桥的《征途》等，都是以具体的叙事者声音进入宏大历史的深情对话。其中有向自然的抒怀，也有对历史的抒情，诗人们或是发时代之问，或是抒英雄之歌，来自真实生活、具体历史的战斗呐喊，使军旅诗歌逐渐在时代洪流中爆发出直击人心的轰鸣。女性声音的加入，更是使壮怀激烈的军事历史具有了细腻可感的真实痛楚。艾蔻在《突围吧！女孩》中，以1941年“反扫荡”梯子沟突围战女学员的身份，将白求恩学校手无寸铁的女学员在枪林弹雨中冒死冲出血路、护送伤员的故事讲给后人，将这场本与“狼牙山五壮士”系同一场战斗却鲜为人知的牺牲写给历史。当诗人说出“女孩，突围！死是正确姿势／借我的死垫高你的死，再借你，再借她／借平铺直叙完成垂直站立”[⑤]时，她就是诗中英勇无畏的女学员，“突围”是在对自己说，也是在对观看这段历史的访客们、重回黎明的新时代说。在三重对话中，有对英雄行为的历史认证、对个体使命的自觉唤醒，也有对和平生活的无上珍视。时代、军旅、生命的崇高感、史诗性，在敞开的主体对话中完成了文化传承。

从独白到对话，从呐喊到共鸣，军旅诗创作者敞开的时代之门，也为“及物”的军旅书写增添了先锋的诗意。他们的对话是掷地有声的，也是色彩浓郁的。如果说“红”是军人生命的底色，那么蓝则是众多诗人灵魂的聚焦点。刘立云在诗集《烤蓝》自序中写道：“军人的一生，其实就像他们的武器被烈火烤蓝那样，始终被烈火烤着。我想说出来的，就是那种蓝。”[⑥]他在《烤蓝》一诗中，将岩浆般

① 刘立云：《歌，或者赞美》，《烤蓝》，第13页。

② 程步涛：《记住这些地方》，《光明日报》2017年8月1日，第7版。

③ 姜念光：《向大炮学习表达》，《钢琴与步枪》，北岳文艺出版社，2024年，第40页。

④ 姜念光：《美学课》，《我们的暴雨星辰》，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第62页。

⑤ 艾蔻：《突围吧！女孩》，《亮光歌舞团》，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第78页。

⑥ 刘立云：《烤蓝》自序，第7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的红与“烤在这块铁上的那种蓝／那种炫目的蓝　隐忍的蓝／深邃而幽静的蓝”[①]相互映照，在鲜明的对比色之中，呈现出军人的隐忍、沉默、刚烈和崇高。蓝，成了战士们汇报自我的具象语言色彩。对于这种色彩，70后诗人刘笑伟和80后女诗人许诺有不同的思考。刘笑伟诗中的蓝色是《昆仑》[②]中的星空与弯月，战士在那里“戍守久了，肌肉会像岩石／岩石也会有肌肉的质感和体温”，蓝色是山泉喷涌成冰刀，是“比天空更湛蓝，比诗句更古老”[③]的思念，也是高原、边境、雪山的背景板。许诺则以南海之上的哨所起笔，为士兵与大海找到了色彩代名词，“在珊瑚身体上长大的／雪白的哨所／紧实的皮肤下跳动着不安分的心脏”，这里大海的蓝就成了“冒险”“远行”和“自由的秘密”。[④]但不论是“精神的蓝”“背景的蓝”“自由的蓝”，还是其他看似无心的与火红相对书写的蓝色，都是军旅诗人对自我和群体生命状态、情感状态的回答，因为立场和信仰足够坚定，所以，不论思想的野马跑得多远，缰绳一直攥在诗人的手中。[⑤]

对话节奏、诗意色彩还离不开诗人对语言修辞、张力的开掘和对新质意象、时代心理的捕捉。创作者钟情于从军旅生活和主体经验的细部出发，及时把握时代新变，在语言和意象的更新中将思考向历史、生命、存在哲学等范畴辐射，使战争与和平、生存与死亡、过去和现在、个体和整体在主体的心理时空产生对话与共鸣，从而呈现出时代、历史、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刘笑伟在《移防之夜》一诗中，以“你的目光里含有冰块／不断撞击着我的脸颊／你向我展示孩子的眼睛／乌黑，透亮——在我手掌中／变成一粒透明的种子”[⑥]，形容即将离开驻守地的心境和重塑团队筋骨的期许。他将自己比喻成要断尾的“壁虎”，见证并参与移防的前夜，诗人看到“爱人”的泪水“流成了一条青蛇／一下子咬在了我的尾巴上”，这个过程让诗人感到疼痛，但他知道壁虎的“尾巴总是要断的”，短暂的告别过后，团队又将重获“新生”。面对时代所趋的变化，诗人看到了滚滚如潮的强军事业背后，个人和家庭的牺牲，更让时代看到了战斗者破除一切障碍的行动力量。与之类似，刘立云《为风暴而生》[⑦]同样是把自我融入时代的生命呐喊。诗人开篇即以“我的狂野来自于我生命的纯粹”自证，并称自己“就是为风暴而生的！也将为／风暴而死”，让“铜质的雨打在我铜铸的胸膛上”，让“我”像礼花一样“把生命中最美的部分，呈献给天空”。诗人将身体和灵魂都汇入自然、汇入时代风暴，以整体的语言象征敬献自我，在宏大话语的修辞中，诗人的生命血气也在尽情凸显。

如果说《移防之夜》《为风暴而生》等诗，是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时代话语呈现，那么《把一首诗在阵地上埋葬》[⑧]则是主体对自我生命过程的具象挖掘。作为“一个喜欢写诗的战士”，那一首埋葬在阵地上的诗歌是诗人的“青春和热爱”，也是“战士诗人”陈灿交出的生命答卷，每一句段的分行排列都是诗人以肉身建构起的信仰，所以这首诗是红色的、蓝色的，也是金色的。诗和青春、战士和诗人，双重话语的交响，奏响了一位战士的生死颂歌。此外，包括董玉方的《持枪歌者》《哭泣的子弹》、朴耳的《资历章》、艾蔻的《伞兵漫游记》、陈贵平的《用西藏的方式去爱你》等诗，都是以修辞和对话的张力介入生命现场的诗意尝试。军旅诗本是战斗集群的歌唱，这支极具情感爆发力和语言创新性的创作劲旅，在对话气势、色彩组合及语言节奏、情绪修辞上进行的写作实践，既响应着诗人战斗

① 刘立云：《烤蓝》，《烤蓝》，第3页。

② 刘笑伟：《昆仑》，《岁月青铜》，第11页。

③ 刘笑伟：《雪山的重阳》，《岁月青铜》，第40页。

④ 许诺：《是蓝色的，也是白色的》，《握过月光的手》，长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第22~23页。

⑤ 罗振亚：《寻找“大诗”写作的可能性——评王久辛的诗》，《光明日报》2013年11月12日，第14版。

⑥ 刘笑伟：《移防之夜》，《岁月青铜》，第59页。

⑦ 刘立云：《为风暴而生》，《金盔：刘立云诗选1984—2019》，第5页。

⑧ 陈灿：《把一首诗在阵地上埋葬》，《解放军文艺》2020年第4期，第113~116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精神的诗意探索，也在无形之中强化了军旅诗歌的力量美。

随着诗人们对生活现场的持续深入，军旅诗中越来越多地出现“迈向世界一流军队的矫健身姿”、先进武器装备竞相列装的蓬勃心跳、浴火重生的军队实现强军目标的感情迸发”[①]等时代具象。比如，峭岩的《朱日和，沙场点兵》[②]和刘笑伟的《朱日和：钢铁集结》等作品同时关注到的“朱日和”这一意象。峭岩从朱日和的历史地位起兴，他的诗中，沙场点兵日的朱日和世界瞩目、雄兵集结，“战车／战舰／战鹰／地上／海里／天空／钢铁大军高山一样林立／新时代的儿女海一样凶猛”。当诗人站上那片新高地，回望历史，思考新时代新军事的新力量，回答他的是，“钢枪说／新在高科技／传统的／机械的／安上了电光互联网的眼睛／导弹不是从想象的那样飞来／无影亦无踪／从梦里掉下来／不惊动一棵草的安宁”，“火箭说／新在一个高度／人类命运共同体／须更宽广的胸怀和视野”。于是，这位老兵、老诗人，决定“重新认识士兵”、重新认识战争，他写道，“我要换一副大脑／和电脑联网／和云端的神秘联网／重新学习现代战争语言／坐上指挥塔台／与风云／闪电交友／与月亮／星星建立感情／练出万能的大脑／适应风吹草动”，数智化的语言和意象中浓缩着一位军旅诗人对新时代的凝视和对未来战争的警醒。刘笑伟则从战斗的集群中，发掘钢铁潜藏的身影，“神舟”“北斗”“天河”“蛟龙”“巨舰”“歼-20”等时代名词成为他诗歌的典型意象，这些词语和意象如同战场上的子弹，颗颗带着震撼人心的力量。诗人把伟大的时代放在这些新质意象中，既展现出新时代国防科技的新风貌，也丰富着当代诗歌的形象序列。此外，包括许丛清的《潜艇在雪花飞舞中解缆》、吕克磊的《逐梦深蓝》、勾婧的《万船出海》、蒲苇的《军歌嘹亮》等，都是新时代军旅生活诗意的具象化探索。这些诗向当下诗坛证明：介入现实的军旅诗，不必以丧失美感和诗意为代价。生活在此处的军旅诗人以及物的书写，踏进社会现实、切入生活细节，用新时代军旅经验激发诗语想象，使21世纪军旅诗歌呈现出兼具筋骨和力量的新诗意。

尽管在某种程度上，21世纪军旅诗并未摆脱对日常语言经验的依赖，对日常语言入诗的艺术性把握也不甚成熟，但整体来看，诗人们基本走出了机械化抒情和单一化语言表达模式，改变了口号式的呐喊与政治化的宣言。诗人们着重思考语言、意象表达生活、生命、生存的艺术性，呈现历史、现实、人性的深刻性，在创作中以语言的在场完成了生与死、历史与现实、具象存在与抽象思维的统一，使军旅诗歌形成了强大的“话语场”，并由此爆发出生命的张力美和崇高的诗意美。

三　美学建构：深化叙事与强化象征

21世纪以来，对技艺的追求依然是军旅诗歌努力的方向之一。诗人们延续并强化着传统军旅诗对叙事、抒情和象征书写的重视，同时，又在其中融入了更开阔的美学视野。时间维度上，与传统边塞诗题材、精神的互通，使当下军旅诗既保持了古典的修辞韵味，又带有先锋诗歌的想象和创新元素；空间维度上，对世界形势的关注和对西方文明的审视，使21世纪军旅诗写作拥有了更广博的审美视域与文化内涵。这些艺术上的拓进，也为切入时代现实的军旅诗建构起更为宽广、深邃的美学阐释空间。

首先，对叙事性的关注是21世纪军旅诗艺术探索的重要面向。其叙事一方面源于古典汉诗的叙事传统，一方面和20世纪90年代新诗的叙事实践互为参照，但根本上又都是将抒情作为最后的精神旨归。其中，长诗是最为典型的以叙事为文本支撑的抒情巨制。军旅诗人们调适着对时代现实、军旅本质和英雄主体的观察姿态。他们用参与者的目光，探悉抒情肌理下时代脉搏的跳动，在

① 刘笑伟：《纸上行军》，山东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27页。

② 峭岩：《朱日和，沙场点兵》，《解放军文艺》2024年第2期，第103~106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现实生活中择取能够使抒情主体敞开心扉的素材，从中发现并确立诗意。

王久辛是作长诗的大家，这位以生命良知感受具象历史的诗人，尤为擅长造境艺术。他的《蹈海索马里》《大地夯歌——谨以此诗为中国工农红军将士铸碑》《肉搏的大雨》等长诗都是历史题材的聚焦型写作，诗歌中密集瓷实的意象、情绪，深入到极致的叙事现场，使他的长诗变成了可以用耳朵去听、用鼻子去闻的真实体验。其中，把军营现实生活作为艺术品经营的典型文本——《钢铁门牙》[①]，是诗人为“从陆军士兵逐步晋升中校团长的一位好男人而作”，这位好男人具有极强的象征性，他代表着“梦中的军人”这个群体。长诗从一位士兵在日常训练中磕掉两颗门牙的往事写起，以诗化的语言和意象记录了士兵将“白色的门牙”与疼痛和血吞下，然后在经年日久的训练中化身为“盘旋的雄鹰”的全过程。贯穿始终的“门牙”与“钢铁”诗性并置，共同成为解读英雄个性的精神喻体。诗人写道：“我的这首诗就是这两颗／白色门牙生根发芽的血肉泥土／在他的灵魂深处和他一起／急行在雪花飞舞的白夜并追随／他的脚窝将深情注入祖国的大地／在他无法坚持的时候／那两颗门牙便会替他／咬紧嘴唇替他咽下泪水／并帮助他嚼碎泰山巨石般的苦难。”门牙在士兵的架子床上，在诗人的字句中，它是具体和真实，又代表无限巨大的能量来源和使命寄托。门牙的残缺对应着生命的残缺，从冷兵器时代先辈的热血到智能化、信息化时代战士的智慧，门牙在残缺中如同“生了根般坚定”，它和军人血肉相融，象征着与生俱来的为和平备战的使命。从精神的整合到肉体的承担，再到落实和平的决心，门牙是象征，士兵也是，《钢铁门牙》这个故事整体更是诗意象征的强化。当军号金色的音波、门牙掉落的血腥气，在长诗重复的艺术循环中渐次袭来，钢铁门牙的叙事便推动着主体沉思的深化，助力着崇高诗情的流淌，诗人也在自觉的审美观照中完成了“一个境界的书写”[②]。

21世纪军旅诗是有重量的写作，但不是空洞的呐喊，它是隐忍的、持续的生命的重量。厚重的战争史、生活史，鲜活的生命运动、情绪起伏，都需要庞大的诗意承载空间，这对军旅诗提出了更高的艺术要求。以事件和情感密度架构起的“大诗”，基本实现了“修正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恢复写作的有效性和活力”[③]的叙事预期，纠正了以往军旅诗歌空洞抒情的弊病和抒情基调单一化、表面化的倾向，艺术性和思想性兼顾逐渐演变成军旅诗人写作的自觉追求。

其次，与同时期的诗歌叙事相比，军旅诗在意象的择取、组合与意境的营造上，更加具有历史延续性。诗人们一面取法古典，在诗歌意境和整体象征层面上，还原战争的悲壮、历史的厚重；一方面又在其中融入时代的生存哲学与个体的生命思考，在个人与时代的精神对话中强化主体的求真意志。以当代军旅诗中最典型的两个意象“枪”和“子弹”为例，刘笑伟诗中“枪的语言是世界上最简洁的语言／只有一句话，不容你回答／或者站起来或者死亡”[④]，以“枪与死亡”的整体象征，提醒人们警惕战争，珍惜和平；离战争再近一步，姜念光以“一枚弹壳立在书架上／似乎在张望／一行早已写完的诗句”[⑤]，来作穿越战争暴风雨的历史见证者；真正走进战争时，李瑛的《遗产》和刘立云的《养在肺里的弹片》却让人真实地感受到与死神共舞的不眠之夜。他们都写到留在将军身体内的弹片，李瑛诗中，“将军已经火化／朗朗的阔笑已经枯萎”，留在身体里的弹片是“狰狞的、卷曲的、锋利的”，那片钢铁透过“骨灰缝隙，冷冷地／窥视着人间”[⑥]；刘立云诗中，将军“从此把那块弹片吞在肺里／

① 王久辛：《钢铁门牙》，《解放军文艺》2024年第10期，第63~68页。

② 王久辛、李文钢：《诗人要完成的是一个境界的书写》，《长江丛刊》2019年7月上旬刊，第28页。

③ 李志元、张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叙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55页。

④ 刘笑伟：《枪族》，《岁月青铜》，第30页。

⑤ 姜念光：《一枚弹壳》，《我们的暴雨星辰》，第80页。

⑥ 转引自朱向前主编：《中国军旅文学史：1949—2019》，江西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301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养在肺里，与它终生／相伴，如同长出了另一页肺”[①]。他们都写到生钢炸裂的弹片长进血肉里的真实经验，揭开直到战斗者死去，战争才算在个体身上结束的残酷事实。和《闲暇时数数子弹》《想象被子弹击中》借描述子弹的杀伤力来控诉战争丑恶相比，弹壳是经历过的战争，弹片却是战争对肉体带来的毁伤性结果，是反复在战争中惊醒的个体真实的生命疼痛。由“枪”到“子弹”“弹壳”再到“弹片”，其实是同一意象的变体，也即“战争”的变体，由它造成的持续性伤害，是数代军人言说不尽的痛苦。这种痛苦的诗意跨越了时空，穿过了柔软的血肉和坚硬的筋骨，真实地敲击着每一位被他们守护的人。

军旅诗人与时代同行，为正义执剑，他们将战斗着的个体放置于人类战争史，在历史的刀光剑影中寻找新时代的同行者。在创作中，诗人们频频回望传统，尝试在古典与现代战争的交织融合中，领悟生命与存在的哲学。如刘立云在《内心呈现：剑》[②]中所写：“我要让一个身穿白袍的人／住在我的身体里／我要让他怀剑，如天空怀着日月／大地怀着青山和江河。”“白袍”与“剑”这对古典意象，既是诗人幽微心灵世界的复杂呈现，又带着独属于军人的精神底色与生命坚守。“白袍”承续着古典语境中白衣剑客的飘逸与大义，褪去俗世的芜杂，成为诗人心中对正义、赤诚与家国的极致坚守；“剑”则是力量、锋芒与使命的具象，其是一种深沉的守护，而非张扬的征伐，“白袍”与“剑”的共生是精神与力量的完美契合。广而言之，无论是侠义传奇中的白袍剑客还是今天的军人，都有着“习以为常的沉默和坚忍”，都可以为了利剑出鞘的光芒、海晏河清的太平，拿血肉之躯充当第一层守护人民的剑鞘。血的滚烫，剑的冰冷，诗人闪光的生命和信仰就投射在“白袍者”身上，烙印在剑影般冷峻的文字里。怀剑即怀志，怀以身报国、捍卫人类和平之心。这柄长剑也悬挂于王久辛的《蹈海索马里》、程步涛的《记住那些地方》、峭岩的《我是一首危崖耸立的诗歌》、艾蔻的《雷神的救赎》等诗中，它或是化身为人，或是战斗者精神的延续、希望的坚守，总是以各种形式影响并塑造着这支队伍的筋骨。这类意象衍生的生命力量是持续的，所拓展的诗意空间是无限的，它的辐射能力远超无所凭依的凌空虚蹈，具有更坚实细密的精神质地。

若说古典诗意的现代链接为军旅诗的书写厘清了历史根脉，那么创作视野与观念的更新则为军旅诗的表达与探索打开了全新的维度。诗歌内容上，诗人们以强烈的时代感受力，将视野从国内历史战争的书写中敞开，投向中国香港回归、索马里维和、亚丁湾护航、驱逐舰驶入红海撤侨等行动中，军旅诗的书写版图随着大国的威严在航迹线上不断延伸。诗歌艺术上，诗人们在借镜传统的同时，也将笔墨放诸西方文明世界，希腊诗人埃利蒂斯的英雄挽歌（刘立云《服从》）、俄国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时代历史反思（王久辛《钢铁门牙》）、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姜念光《急雨赋》）、聂鲁达的情诗、老阿多尼斯的传说（李庆文《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等，都转化成了军旅诗叙事、抒情和象征、隐喻的片段，诗人们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聚焦时代风云，磨砺思想硬度，使军旅经验的美学转化获得了更强劲、幽深的精神势能。

诗人汗漫曾在组诗《致诗人们》中，以“雪地虎啸”致敬周涛，认为其诗写如“乘火焰穿越烟囱抵达云端”，其作品诗风桀骜、意境阔达、修辞有据、力道超群。[③]21世纪军旅诗的整体艺术风貌也是如此。随着越来越多知识结构、诗歌写作经验完善的青年创作者的加入，军旅诗人对传统诗学资源的诠释、对军旅生活细节的把握更加成熟，诗歌的美学视野也更加宏阔。创作者们借语言更新、意象重塑、叙事深化和整体修辞带来的新视角与新思维，更新着军旅诗言说的技巧和诗意，其创作直觉与理性交融互渗，叙事与抒情辩证统一，在强化军旅诗筋骨、力量的同时，也让21世纪军旅诗歌

① 刘立云：《养在肺里的弹片》，《烤蓝》，第198页。

② 刘立云：《内心呈现：剑》，《烤蓝》，第8页。

③ 汗漫：《致诗人们（组诗）》，《草堂》2024年第4卷，第7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拥有了“直面历史与时代现实的强大精神膂力”[①]。

结　语

21世纪军旅诗以贴近时代，深入现实的书写更新着军旅经验的美学表达。诗人们沿着及物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进行着有良知、有深度、有筋骨、有力量的诗歌写作。军旅经验的陌生感、诗语呈现的冲击力以及强劲大气的美学风貌，让读者对当代诗歌有了更多元的期待。这种创作打破了当下诗坛单一化、模式化的经验认同，为缺少时代气息、力量质感的当代诗歌吹入了一股劲风。但从整体上看，思想的力量无法融合语言的创造，不仅是当代诗人无法避免的艺术局限，这种思想与语言无法有效对接的无力感在军旅诗人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过于直白的言语表达、缺乏诗意的经验复制、时代感知的滞后、深度思考的离席等，仍是军旅诗亟须解决的实际问题，同时也是21世纪军旅诗阔步向前的艺术动力。百年新诗发展的经验和标准可能并不全然适用于军旅诗，但在艺术探索这一层面上，21世纪新诗发展的路向和经验，足以为其创作提供技术指引与方法借鉴。

诗歌本是抒情、言志之体，创作主体更没有大我和小我之分，每一位抒情者都是时代的见证者，只有鲜活、真诚的生命体验书写，才是真正的时代声音。军队并未与军队以外的世界隔离，军旅诗本身也并不狭窄，“它拥有一个规定的但宽广的时空”[②]。军旅诗的意义是时代和人民赋予的，是其面向的受众群体（战士们）赋予的。也许，当我们看到军旅诗在当代诗坛（包括诗歌史）表面激起的一丝微不可见的涟漪时，它早已在传唱和学习对象的情感乃至精神世界掀起了惊涛骇浪。对创作者来说，军人身份既成就着其诗歌写作的独特性，也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束缚着他们艺术表现的宽广性和深刻性。白话新诗走向艺术自觉的过程，都是在“戴着镣铐跳舞”，军旅诗的创作更是如此。创作主体只有立足现实、立足本位，用“活”用好军旅生活经验、传统文化资源，不断向内沉淀、向外敞开，才能将“镣铐”化作“翅膀”，才能创作出更多无愧于自我、时代与人民的优秀作品。

（卢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沙沙，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New Aesthetic Changes in Military Poetry of the 21st Century

Lu Zhen　Liu Shasha

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military poetry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in its linguistic foundation, mode of thinking, aesthetic orientation and ideological essence. The multi-dimensional exploration of historical scenes, the matter-of-fact inquiry into life states, and the poetic reflection on the life of the time have become the prominent themes of military poetry creation in this period. The poets presented the iron-clad dedication and spiritual strength of soldiers in the form of poetry. The poetic creation, with its magnificent momentum and vigorous character, expands the aesthetic realm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and enriches the possibilities of writing new poems. Military poetry in the 21st century is irreplaceably valuable in the new Chinese military poetry and the history of new poetry.

Keywords: the 21st Century; Military Poetry; New Aesthetic Changes

① 霍俊明：《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页。

② 谢冕：《一个独特的诗歌世界——论当代中国军旅诗》，《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4期，第32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